

吴趼人小说研究

◎ 王国伟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WUJIANREN XIAOSHUO YANJIU

齊魯書社

吴趼人小说研究

◎ 王国伟 著

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WUJIANREN XIAOSHUO YANJIU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趼人小说研究 / 王国伟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7. 1

ISBN 7-5333-1743-2

I . 吴... II . 王... III . 吴趼人 (1866 ~
1910)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520 号

吴趼人小说研究

王国伟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 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 sdpress. com. 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32

印 张 9

字 数 226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743-2/I · 325

定价：20.00 元



王国伟，1974年生，山东烟台人。1998—2004年就读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在《山东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省、校级科研项目三项。

总序

这套《济南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的问世,是济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重点学科建设结出的一颗硕果。作为省级重点学科,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校、院两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构建学术梯队,强化科研意识,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层次合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术队伍。先秦文化与诗学、宋代文学、近代文学是学科中较为突出的几个研究方向。我们策划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为本学科高层次学术成果提供一个良好、有效的发展平台,希图进一步积攒力量,夯实基础,扩大影响,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本学科的学术骨干和学术梯队的核心成员,他们绝大部分具有博士学位,有的还曾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从事过研究工作。这些成果凝结了作者数年来的心血,同时也将是其未来学术之路的重要奠基石。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传统的学术研究早已走出单一、狭窄、封闭的格局。作为中青年学者,既要秉承传统学术方法的熏陶与滋养,又须具备接受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灵敏触角,

唯其如此，才有希望开辟出一个学术研究的新纪元。从这一点出发，本套丛书选题的中心虽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但其实际涉及面却较为广阔：既有传统的作家作品或某一时期文学的个案研究，又有宏观的综合文化研究。文学发展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与社会历史文化割裂的，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常常习惯于将社会历史文化作为文学的背景，这样，被关注的对象就只能是一条纵向的线式“文学史”。我们在这套丛书中就力图突破这种观念，将思想、哲学、艺术、宗教等纳入“大文学史”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文学存在的本真面目。这在我们来说，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尝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在研究方法上，既有社会历史学的考据论证和理论阐发等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又不乏诸如诠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尝试运用。总之，力求做到兼容并蓄，多方面开拓研究视野。

为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济南大学的相关领导给予了殷切的关怀，有关部门提供了出版基金，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齐鲁书社的陈修亮编辑积极策办丛书的出版事宜，其敬业精神令人钦佩。

随着济南大学各个学科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着光辉的顶点攀登。与兄弟院校的同行们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但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和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相信未来之路是无限光明的。

前言

作为晚清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吴趼人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创作，不但为中国小说在由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收获，而且是完成这一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本书即以吴趼人的小说为讨论对象，重点分析了这些作品的社会生成机制，以及其中所表现出的一位处于中西碰撞、新旧嬗变时期的中国作家思想上的前进、彷徨与退缩，和他在小说写作艺术上所进行的汲取、探索与创新，力图展示吴趼人的创作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所蕴涵的丰富的可能性。

本书首先梳理、分析了吴趼人的生平和文学活动。吴趼人主要生活于上海。他先后参与主办、编辑过多种报刊，为繁荣文艺市场，推动文学转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吴趼人全力投入小说创作，堪称中国职业小说家第一人。他较为注重小说理论，就小说的社会作用、历史小说的创作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吴趼人强调小说的政治教化作用，片面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他提出的“写情”小说理论，为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风起云涌，为小说由对外部世界的观照转入对内心世界的开掘，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吴趼人创办的《月月小说》，跻身近代四

大小说杂志之一，提倡趣味性、消闲性，促进了小说向文学本体的回归。

吴趼人小说产生于近代文学社会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扭转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强调小说在文学中“最上乘”，使其逐渐由边缘地位向中心移动。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上海以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地缘政治环境和产生于其间的市民大众阶层，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较其他封建传统城市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印刷技术的提高，从器物层面上推动着小说的发展，并直接催生了传播行业、传播理念的变革。兴盛发达的报刊，既刺激了对小说的需求，又提高了小说的传播速度，培育了稳定的读者群体，扩大了小说的销售。报刊对小说体制的演变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小说的发展离不开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阅读接受。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教育体系的发展，孕育出一批新的小说作者并培养了广大的读者群体，逐步完成了小说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过渡。逐步确立、完善的小说稿酬制度，直接用货币去表现商品经济形态下的精神产品的交换价值，实现了精神产品货币化的合法化，使得市场机制下艺术创作成为一种生产活动。稿酬制度还推动了职业作家群体的产生。

贯穿于吴趼人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恢复旧道德”的道德救国理论。吴趼人幻想从传统的儒家思想里寻找改良武器，拯救中国社会危如累卵的深刻危机。这种复古主义价值认知观，是吴趼人糅合新旧、中西文化后探寻到的国家、民族出路，也是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就政治主张而言，吴趼人提出了“文明专制”的政体设想。这是他心中虚构的乌托邦世界，反映了一个努力想跟上时代步伐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于别人而独立发表政治见解的心声和他对祖国美好前景的执着追求。从保守、

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吴趼人反对革命,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挖苦和揶揄。由于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吴趼人产生了消极悲观思想,转向“厌世主义”。对此,我们应给予客观的评价、辨证的分析,不能望文生义。吴趼人小说所涵盖、容纳的范围极其广博,举凡社会的各阶层、各方面,时代的重大事件、矛盾冲突等,在他的笔下都有深浅不一的描写、反映与折射。他将家族、官场、洋场、士林、军事等众多迥然有异的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据笔者统计,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便描写了 111 个故事、笑话(其中 106 个故事,5 个谐谑调侃性质的笑话)。并且,吴趼人并不停留于穷形尽相、振厉末俗的各种“怪现状”的展示,而是努力发掘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并发表自己的“补天”之术。作为觉醒的先知与无畏的战斗者,对传统的鸦片、赌博、迷信等恶风积弊造成的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与破坏,吴趼人以笔为矛,进行了大力批判。吴趼人对妇女问题非常关注,积极宣传妇女解放,刻画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吴趼人打破了文化一元论,站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主张学习西学,研究西方文化。

吴趼人中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是卓立不凡的。它们充分表现了作家多样化的追求和个性化的表现风格。他积极开拓,多方面尝试小说题材、体裁及艺术表现的突破,表现了敏锐的前瞻性与可贵的创新性。在晚清普遍忽视甚至抹杀小说艺术性的氛围中,吴趼人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原则,堪称众声喧哗中的特立独行者。吴趼人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精华,同时吸取了外国文学的大量有益成分,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方面进行了多方探索与创新,冲击了以说书人为表征的传统叙事模式。在结构方面,吴趼人小说虽然不免带有晚清小说的特有烙印,但在更多方面已学习和借鉴西洋小说,自觉进行了多样化的追求。借助

寄托讽喻主旨的开篇、感时伤世的悲剧性结局及浓厚的说教劝喻色彩，吴趼人表达了讽世之意、悲世之情与劝世之心。它们极好地展示了在那个动荡多变的大时代中，作为尚未与传统诀别而又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代知识分子，其困惑、矛盾与徘徊、踯躅的心路历程。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吴趼人以性格的复杂性、成长性、对比、照应手法和肖像、语言描写等，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圆形人物，冲击了传统的扁平式人物描写方式。这其中高超的心理描写是最为人称道的一点，他将大量心理描写介入叙事，并以心理描画为主要手段来表现人物，推进情节。这不仅使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获得一股强劲的推进力，而且也为丰富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人性开辟一大源泉。吴趼人的中长篇小说具有鲜明的“新闻体小说”的特色，时间性、通俗性、趣味性是它的三大特征。小说以迅速地反映、干预现实为旨归，采用了报刊连载的特殊形式，由此在结构、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小说截然不同的特色。吴趼人小说面向的主要读者群体是广大市民阶层和普通百姓，作品带有俗文学的深刻印记。吴趼人小说除在沟通目的上充分照顾以世俗为主体的接受者，选材上俯就文化意识变动滞后的世俗大众外，还反映在结构方式与艺术审美风格上对传统文学的借鉴与模仿。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吴趼人的生平及文学活动	22
第一节 吴趼人生平	22
第二节 吴趼人的小说理论	36
第三节 创办《月月小说》的功绩与历史意义	56
第三章 近代文学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变	
及对小说的影响	65
第一节 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理论的影响	70
第二节 上海的独特地位对小说的影响	77
第三节 印刷、出版业的发展	85
第四节 报刊的巨大推动力作用	94
第五节 教育变革与小说作者读者群的双重扩大	105
第六节 稿酬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114
第四章 吴趼人的短篇小说	129
第一节 表现领域的突破	132

第二节	艺术形式的创新	138
第五章	吴趼人小说的思想内容	143
第一节	新旧杂糅的价值认知体系	143
第二节	晚清浮生绘——吴趼人笔下的社会众生相	165
第三节	痛陈社会积弊	189
第四节	知性认识,困惑心态——吴趼人对西方文明的态度	199
第六章	吴趼人小说的艺术特色	205
第一节	叙事模式的新变	207
第二节	多样化的结构形式	221
第三节	劝世·讽世·悲世——吴趼人多维理念在小说中的折射	231
第四节	以心理描写为代表的艺术手法的创新	241
第五节	独步古今的新闻体小说	251
第六节	徘徊在新旧雅俗之间	263
第七章	结语	268
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79

第一章 引言

晚清小说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仅在数量上便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历史时期小说的总和。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统计，中国古代（唐代至鸦片战争）共有小说 502 种，而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短短七十年间，就有通俗小说 662 种，其中 1901 年至 1911 年的十年间即创作小说 529 种，这还不包括翻译小说。^① 20 世纪最初十年间的小说数量比唐代以后整个古代一千余年的小说数量还要多。而整个近代小说的总量，就更是惊人了。据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中国近代共有创作小 13810 种（含再版、重印版、影印版），翻译小说 5346 种。^② 而这些小说主要的创作年代是在 1898 年至 1919 年。

^①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4 页。参见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② 参见〔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统计，齐鲁书社 2002 年版。

的二十年间。^① 小说之所以能够在晚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与当时的时代及文学背景息息相关的。

晚清，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② 中华民族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地缘政治形势产生了极大变化。与数千年北方大敌的压力不同，中国首次同时遭到海陆两大集团的打击——英国与俄罗斯，这可以看做西方力量对中华社会的第一次合围。中西两大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撞击。这一撞击，就如同一个在海上颠簸多年的超负荷的巨型木船与一艘新型铁舰的撞击。即使没有这外力的一击，这一巨船也将被自身爆发的危机击沉。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外敌的入侵，内忧的加剧，迫使古老的中国挣脱传统的枷锁汇入近代世界的洪流之中，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当世界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楔入中国，打破了它“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③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之中。这样，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政治侵略与经济掠夺，不得不把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引入中国，使中国能满足其侵略与掠夺要求，而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的侵入“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

^① [日]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齐鲁书社 2002 年版，第 329 页。

^② 李鸿章、王韬、严复皆说此话，载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91 页。

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①“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②中国社会的经济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伴随着“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要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③，古老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蚕食下开始土崩瓦解。这首先体现在家庭棉纺织业的瓦解。家庭棉纺织业是自然经济的基石，也是维系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的解体既削弱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又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土而出扫除了绊脚石。

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昭示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中国的近代工业开始蹒跚起步。鸦片战争后，外国工厂是古老的东方大地最早出现的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大机器生产企业，对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起到了催化和诱导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则是近代工业的起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认识到了机器及工业生产的巨大威力，认为机器制造是御侮、自强的根本，为此他们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与民用工业，揭开了近代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

序幕。随后,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随之产生了。

与经济变化同步的是政治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家主权的丧失,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政府也逐步沦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成为列强在华的忠实代理人。但中国社会在沉沦的同时又萌发出新的生机,这就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与民主革命的高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灵魂附着在科学技术的躯体上悄悄地叩开专制的大门,这犹如启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人们以西学为思想武器,向专制统治发起了猛烈进攻。人们纷纷以犀利的语言,攻击封建三纲五常的荒谬毒烈。维新志士谭嗣同痛斥“二千年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礼”,他发出“冲决网罗”的呐喊,高唱“冲击伦理之网罗”、“冲击君主之网罗”、“冲击一切之网罗”,从而吹响了向封建专制统治进军的号角。^① 人们也纷纷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为蓝本,强调“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认为“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于是“醉心民权革命者,日夕以此相鼓吹”,“此论一倡,遂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② 这样,议会、立宪等都被提到政治实践层面上加以讨论,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深入到理论层次,以西方政治模式来谋求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开始在中国上演,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爆发便是标志。

文化是政治与经济的反映,近代经济与政治的变化必然导

^①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48页。

致近代文化的新变动。一方面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近代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运动节律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演变等都从根本上动摇了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文化在近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而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思想的熏陶与启蒙运动时自由、民主、理性、平等精神的洗礼,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突飞猛进,呈现出无限的生机,它的传入也使传统文化走出狭小的天地去拥抱世界文化。近代的新文化也就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产生了。鸦片战争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反思战争失败的过程中开始把目光投向域外。魏源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近代学习西方文化的先河。虽然“师夷说”为西方文化跻身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它被国人广泛认可却是在洋务运动之后。19世纪中叶,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从物质层面上正式承认了中国文化的落后,并在自强、求富的名义下吸收西方文化,如创办洋学堂、派遣留学生、兴办译书局等,这就使得以语言文字、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为主体的西学逐渐在中国得以立足。甲午战争后,西方文化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大举涌入,特别是进化论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输入,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样,西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其内容在不断深入,从语言文字、自然科学技术到政治理论、社会学说等;其传播范围也在不断拓展,从沿海通商口岸到内地偏僻乡村。

为维护自身利益,统治阶层不得不开启改革之门。1901年1月29日,清廷颁布上谕,即著名的《丁未谕旨》,揭开了晚清改革的序幕。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